

《無名書》是「新浪漫派」文學的重要作品，但它並沒有在大陸完整地出版，讀者很難睹其全貌。而《輕逸與沉重之間》對《無名書》的成因、創作軌跡乃至人物內涵的構塑都作了詳盡而扎實的分析，成為至今為止對於該部重要作品分析的權威闡釋者。

命的『生命哲學』。是一種『生生之謂易』的『天道』之學，屬於一種『參天地贊化育』、『天人合一』的『道問學』的中國哲學傳統。」(頁5) 通過《無名書》，無名氏實現了對「西方非理性的欲望中心主義的超越」。該書將研究《無名書》的「時代意義」歸結為「在傳統文化的神聖性為『現代性』脫魅之後，重建文化傳統的『神聖性』的努力。」《無名書》「所破解的正是現代性文化最深的內核，即主客二元對立的唯物論」(頁141)，試圖從另外的途徑重建人的生存意義與價值世界。

俄國批評家佩列維爾澤夫(Valerian F. Pereverzev)在《俄國

現實主義長篇小說之源》中通過對俄國文學史上的「失蹤者」的探尋和發掘，為俄羅斯文學理論體系的整體構築提供了可能，從而為他後來構造《形象詩學原理》的理論譜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也得以從文本的現實出發還原俄羅斯文學的真實場景。近幾年來，新文學也掀起了尋找「失蹤者」的熱潮，應該說如何尋找很簡單，只要回歸到文本創作的現場，應該都不是甚麼難事。問題在於，尋找後如何闡釋，如何定位才是重要的。在這方面，《輕逸與沉重之間》無疑給我們樹立了發現和鑒別新文學「文物」的樣板。

## 制度建設與學科發展

- 王建偉



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

桑兵曾在〈二十世紀前半期的中國史學會〉一文中，論及近代史家對自身的史學會歷史的認識不夠清楚，「近代史家治史，首在求真，可是對於自家的歷史，似乎不夠重視，有關史事，鮮有論及；即使有所論列，也是言人人殊。」(桑兵：

〈二十世紀前半期的中國史學會〉，《歷史研究》，2004年第5期，頁116。）台灣東吳大學歷史系劉龍心女士也有這樣的感歎：

做為一個專門記錄別人歷史的人，我們對於自己的歷史有多少了解？特別是從事現代史學史或學術史研究的我們，又是不是曾經花過一點點時間去回顧一下自己的歷史，並思考一下這個長年供養我們習史、寫史的環境究竟是怎麼形成？怎麼出現的？而這樣的環境，又給了我們甚麼影響？甚麼訓練？甚至於甚麼限制？（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頁1。以下簡稱《學術與制度》，凡引此書只註頁碼。）

雖然二者指涉的物件並非一致，但他們關心的其實是一個問題，即歷史學作為一門學科，是在甚麼樣的制度環境中發展的。這也正是劉龍心《學術與制度》一書所要努力回答的問題。

通常，探討現代史學在中國的建立，很容易形成我們所謂的史學史和學術史的寫作。一般來說，史學史和學術史主要側重兩個方面：一方面側重學術的思想和社會語境與學術發展的關聯，另一方面側重學術發展的內在理路（這只是一種大致的劃分，實際上，愈來愈多的研究已將二者打通）。既往港台及大陸關於現代中國史學史的研究論著中，多以學派、思潮、運動和人物為中心。近幾年來，一些學

人逐漸把注意力集中於制度建設與學科形成之間的關係上來，形成所謂的「學科史」的寫作。本書就是作者在這方面所做的一種嘗試性努力。

何謂「學科」？其英文對應詞是Discipline。沙姆韋 (David R. Shumway) 及梅瑟－達維多 (Ellen Messer-Davidow) 的〈學科規訓制度導論〉把學科與學術社群聯繫起來，「學科首先是一個以具有正當資格的研究者為中心的研究社群。各個體為了利於互相交流和對他們的研究工作設立一定程度的權威標準，組成了這個社群。」（轉引自沙姆韋、梅瑟－達維多：〈學科規訓制度導論〉，參見華勒斯坦 (Immanuel M. Wallerstein) 等著，劉健芝等編譯：《學科·知識·權力》〔北京：三聯書店，1999〕，頁20-21，以下簡稱「沙姆韋」。)

在劉龍心的解釋中，它是「清末採行學堂分科教育以後才逐漸由西方引進的一種知識分類概念，在定義上，它具有學術領域、課程、紀律、嚴格的訓練、規範、準則、約束以至薰陶等多重含義」（頁2）。透過新式教育的推廣，這種以知識性質作為分類標準的學科概念，非但正式成為近代教育體制中分門劃界的主要依據，同時也構成了二十世紀學術發展的基本架構。作者在緒論中提出：

如果我們企圖從制度面的角度，去觀察現代中國史學建立的問題時，絕不可能忽略學科體制對它所產生的影響，其中以學院為基礎建置的

以往關於現代中國史學史的研究論著，多以學派、思潮、運動和人物為中心。近幾年來，學人逐漸把注意力集中於制度建設與學科形成之間的關係上來，形成所謂的「學科史」的寫作。

如果我們企圖從制度面的角度，去觀察現代中國史學建立的問題時，絕不可能忽略學科體制對它所產生的影響，而以學院為基礎建置的大學，更是形塑整個學科體制當中最重要的一環。

大學，更是形塑整個學科體制當中最重要的一環，不以大學為觀察焦點，無以說明現代中國史學建立的過程。(頁3)

桑兵也認為1920-1930年代，以史學為中心的中國學術呈現一大變局，「而當時教育制度根本改變，大學分科教學的專門化、現代化與本土化，實為影響史學轉向並造成流派分界的重要因素」，由此立論，「可以進一步深入認識轉向的成因、變化的階段以及分歧的關鍵。」(桑兵：〈教學需求與學風轉變——近代大學史學教育的社會科學化〉，《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4期，頁169。)

這正是《學術與制度》一書所要探討的核心問題。作者的目的就是想「深入了解傳統史學在整個教育體制徹底西化之後，究竟產生了甚麼樣的變化，以及這個變化對身處其中的我們，又造成了甚麼樣的影響。」(頁11)

全書以現代大學史學教育與學科形成之間的關係為視角，主要從三個方面考察了歷史作為一門學科，在現代中國學術領域內興起、成長的歷史。

第一個方面，從晚清新式學堂採行分科教育的內容及清政府歷次頒布的學堂章程中，觀察近代學科體制最初建立的過程，並且分析當時左右學堂發展的「中體西用」思想，究竟如何影響學堂設科分類的概念。而一直扮演為經學舉證事例角色的傳統史學，此時又是以何種姿態開啟與西方史學的對話之門？

第二個方面，以民國初年唯一設立史學系的北京大學作為觀察焦點，探討現代中國史學如何在學院化的體制下，逐步確立其學科獨立意識的過程；並將北大史學系的課程架構放到近代史學發展的背景下，觀察現代中國史學如何藉着學院本身的建制，釐清史學在現代學科體系中的範圍、性質與定位。

第三個方面，從各大學歷史系所設置的方法論課程中，探討現代中國史學是如何建立起屬於自己的學科專業理論體系和一套標準化的技術程式。同時，集中討論近代學科體制建立以來，在學院建制中執教與受教者資格認證演變的進程，以及雙方在互動關係中所產生的規訓力量與評價機制，藉以觀察現代中國專業史家形成的條件與過程，對現代中國史學逐漸走向專業化的進程，提出進一步的觀察。

探討一門學科在現代中國的興起，可以涉及到許多方面，但以拙見，既往著述對於學科興起的制度化憑藉的關注，稍嫌不夠。本書所要着重梳理的即為歷史教育與史學研究的關係問題，正如副標題所言，全書都是圍繞「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這一主題展開。學科的生長，知識的生產，離不開教育，離不開大學。正如沙姆韋所言：「近年我們才開始視學科為特定於歷史時空的形式。自從曼海姆(Mannheim 1936)和知識社會學的出現，我們業已認識到知識可能是建構在意識形態或利益的基礎上。」

我們亦覺察到特定的社會結構諸如大學研究或專業主義等怎樣組織知識的生產。」(沙姆韋，頁12-13)

同時需要說明的是，作者雖然也從學派、思潮、運動、人物或特定機構的角度觀察現代史學的興起，但最核心的角度卻是從一個更廣闊或更結構性的因素裏去審視現代史學，即在制度層面上考察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而且，作者還盡量充分收集了史家的回憶、日記及自傳等，極力還原民國史學界的學術生態與史家的人際網路，力爭最大限度地彌補純粹制度史研究的模式化不足。而歷史的影像是否能夠還原，在歷史學界還是一個大可探討的問題。

如同書名所言，此書是探討學術與制度之間的互動關係。制度化的東西讀起來是很枯燥的，然嚴謹的學術探討並不一定與「有趣」聯繫在一起。而作者帶着自己強烈的問題意識，逐漸於枯燥無味的制度中看到了「活躍於制度底層人群的活動與思考，也看到了曾經參與建構體制的人，最終不免也為制度所塑；制度不再是孤懸的條文，也不是乏味的規章，制度背後所顯映的是人們對問題思考的路徑以及對時代所做出的反思。」(見本書自序，頁ii)

本書對於民國時期各個主要大學史學系內的課程設置，課程規劃等原始資料的引述相當豐富。由此可見作者在資料的收集方面，用力甚勤。尤其是作者深入北京、上海、廣州的許多老牌大學的檔案館，發掘出各個大學在民國時期大

量的課程指導、分科規程、入學試題、學程大綱等，其中絕大多數材料都為作者首次使用，這使得本書的論述建立在強大的史料基礎之上，言之不虛。

本書所探討的內容，從更廣闊的範圍內看，是中國近代知識轉型的問題，此一問題近來已吸引了學界愈來愈多的關注。據筆者不廣的見聞，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的成長史都已有不錯的成果(孫宏云：《中國現代政治學的展開：清華政治學系的早期發展(1926-1937)》(北京：三聯書店，2005)；姚純安：《社會學在近代中國的進程(1895-1919)》(北京：三聯書店，2006)；閻明：《一門學科與一個時代——社會學在中國》(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也有人正在以商學、英語等學科的形成作為自己博士論文的題目進行嘗試，惟其效果如何還不可知。探解一門學科的形成可以落實到許多層面，而從制度建設的角度考察其形成過程，劉龍心女士提供了一個比較好的參考個案。

近年來，大陸與港台的學術交流愈來愈頻繁。大陸組織的清史編修工程已經邀請港台同行共同參與，不管是大陸還是港台的學術雜誌，也愈來愈多地刊登海峽對面學人的文章，兩岸學人也經常共同出現在學術會議上。更多的學術交流對提高整個中國的學術水平非常有益。希望哪家有眼光的出版社能夠以簡體字的形式在大陸出版此書，從而使更多以史為業的人能夠分享此書的成果。

作者從一個更廣闊或更結構性的因素裏去審視現代史學，即在制度層面上考察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他充分收集了史家的回憶、日記及自傳等，極力還原民國史學界的學術生態與史家的人際網路，以彌補純粹制度史研究的模式化不足。